

J 焦点网谈

就上访户有精神病言论
北大教师孙东东致歉

新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师孙东东4月6日通过中新网发表致歉声明，就其最近在接受采访时一些内容表述不当引起争议和误解表示遗憾。他表示，如果因这些内容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诚恳地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歉意。（4月7日《京华时报》）

照他这么分析，那些信访部门应该成立精神病门诊啰。

——新浪网友

有这样的老师说这样的话，作为中国人我感到可笑，不是别人有精神病是他自己有问题吧。

——北京网友

我看不要叫他孙东东了，还是叫孙神经吧！这个网名最适合他了。

——人民网

有病没病，群众的眼睛是亮的。

——南海网

温州老板施粥 65 天 因卫生问题被迫停止

新闻：从今年大年初五开始，在义乌打拼多年的温州老板林如新开办的施粥摊已经坚持了 65 天，“每天要分掉 1000 碗粥，2000 个馒头。”4 月 1 日，义乌当地卫生监督部门工作人员到施粥摊检查，并口头提出了施粥人员有没有健康证、如何保证碗筷的消毒等问题。反复商量的结果，林如新决定从 5 日起停办施粥摊。（4月7日《东方早报》）

人心的干净比餐具的干净重要多了！对林老板赞一个！

——人民网

政府不应做懒人，要让现在社会提高人性的善良一面，给予扶持，帮助和指导才对！

——新华网

应该由政府来组织做好这件事。一天 1200 元就能维持一千多条生命，而官员们一桌酒席何止千元啊！

——南方网友

有的人心是火热的，而有些人的心是冰凉的。

——南海网

T 头条评论

□ 王毅

4月6日出台的新医改方案重新确立了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同时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新方案实施后，百姓看病自付比例会降低，药价会大幅下降。应该说，这几个框架式的原则得以确立之后，千

新医改仍需直面医药分开问题

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医改方案终于让人们看到了一片亮色。从新医改方案公布之后，公众与媒体对此表达的谨慎叫好来看，新医改迈出的第一步无疑是成功的。

但无论是把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还是确立医疗改革过程中的政府主导地位，抑或是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设想，这些原则涉及的只是新医改方案之中最粗略的也是位于最上端的内容，犹如一个大厦搭起了钢筋水泥的结构，但最终新医改的大厦能否起到为绝大多数的公众遮风挡雨的关键性庇护作用，依然取决于细节性的老生常谈式的问题，譬如如何让医药真正分开。

说到医药分开的问题，就在新医改方案出台之前，各地也纷纷进行了各种形式的尝试，譬如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说法是，以“药房托管”的方式促使医药分开。但在行内人士的眼中，这种所谓的尝试其实不过是“另种形式的以药养医”。再如，当许多地方流行的收支两条线，也同样会遇到类似的困惑。倘若医药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依然藕断丝连，那么就算是收支两条线得以贯彻，依然会有出于利益动机之下的大药方存在，收支两条线同样斩不断医药纠缠在一起的乱麻，更不用说药费的增加还会增添公众看病的额外负担了。

应该说，公众的担心是非常有道理的。

对此，一些专家提出了以医生的收入应与工作量、解决问题的能力挂钩，而非与医生的营业额挂钩，来真正解决大处方、大检查的问题。这个方法也是正确的，但前提是国家必须加大对公立医院的投入，国家必须加大购买医疗服务的力度。

换言之，要彻底取消以药养医这一根深蒂固的机制，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医保机制。显然，这个机制应该是建立在以国家购买医疗服务，全面提高医疗工作人员的收入为基础的，离开了这方面的高额收入，而奢望医疗工作人员能在所谓医德的约束之下自觉抵制以药养医的巨大诱惑，不是说没有这样的医疗工作者，但这样的医疗工

作者实在太少，与视拿红包为惯例的医疗工作者人数相比完全不成比例。

所以，不论新医改方案为我们描述了三年之内的短期目标，还是为我们勾勒了怎样一幅美好的远景图像，但那毕竟是基于理想状态之下的合理想象。要想真正达到这一美好的目标，有关部门还必须制定相关的一系列制度，既能坚决切断医药不分的利益纠葛，同时再以国家加大对医疗方面的投入，让绝大多数医疗工作者通过辛勤工作确实拿到体面的收入，而只有二者有效地结合起来，方能真正让医药彻底分开，从而最终解决看病难与看病贵的根源性问题。

公车节能 有利于让路于民

□ 长青

“广东省‘十一五’后两年公共机构节能计划征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发布，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号召在广东大力开展公务用车节能。除特殊公务车外，各级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事业单位的公务车按牌号尾数每周少开一天。（4月6日《广州日报》）

在公车配备上，许多发达国家都坚持提高效率、节省开支两项基本原则，并据此作出各种具体规定。这些国家对私人汽车的控制确实都非常严格，但前提是公车的控制更严格。正因为如此，他们可以把控制私人汽车当作“控制城市汽车保有量”的有效举措，进而缓解公共交通所面临的压力。毋庸讳言，在我国的多数城市，纵横驰骋于道路之上的很多都是公车。在此背景下，如果照搬别人控制私车的举措而不借鉴其控制公车的办法，就难免会给人留下“捏软柿子”的嫌疑。

有调查显示，机动车总量不到三分之一的公车竟然占有了 80% 的道路资源，公车对交通拥堵的“贡献”由此可见一斑。无论是从节约财政开支还是减少能源消耗，抑或厉行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讲，公车都理应首先做出表率。正因为如此，广东省发起的“公车节能”计划值得我们叫一声好。通过这样的活动，也可以借机梳理“究竟有多少公车为必需”这样一个现实问题，从而为下一步的公车改革提供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

失业率数字打架“打”出了什么

□ 陈一舟

中国社科院于 2008 年 12 月 16 日发布调查报告称中国城镇失业率攀升到了 9.4%，已经超过了 7% 国际警戒线；而今年 3 月份国家人保部公布的去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 4.2%。两相比较，前后数据竟相差一倍。差异缘于城镇登记失业率和调查失业率是两个不同概念，相比而言，城镇调查失业率更接近现实失业情况。（4月7日《中国经济周刊》）

一个是调查数据，出自社科院，而另

一个则是登记数据，出自人保部。正如有关部门表示，由于“统计方法的差异”，出现“数字打架”似乎非常正常——走出去的调查与坐在办公室里等待失业者上门登记相比，当然是前者获得的信息更全面、更真实可靠一些。

其实，数字打架压根就不是统计方法的差异，而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一则，方法的差异的背后是作风的不同。人保部门当然明白“向外调查”所得的数据更清晰直观，更具有说服力，但“调查”毕竟是要费时费力，哪如“登记”这般来得舒服和惬意，只要失业者上门填填表格就可以一了百了。

而在事实上，国家统计局从 2005 年底就已经开始就城镇调查失业率进行试点，到目前为止共进行了 7 次失业调查，但至今没有对外发布数据。我想，根子正在于上面所说的“复杂纠结”。任何原汁原味的汤水，只要添加了各种各样的“行政调味品”，就

会变味和变质。

对于数字打架，公共社会和公共舆论不过是抱着一种“旁观”的态度。什么更接近事实真相，哪一种数据更符合民生，大伙儿心底都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就像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里所唱，“天地间有杆秤，那杆秤是老百姓”。而到了非取舍不可的地步，人们也自然宁可信其“忧”而不信其“喜”，宁愿相信当今的失业率较大，为自己的人生未来做好更完善的打算，这便是普罗大众最基本的生活哲学。

在我看来，数字打架主要的危害体现在，误导公共决策，最终还是导致民生利益受损——使各级领导干部感觉不到百姓失业生活的压力，使中央和国务院领导人在对控制物价、还是要促进就业进行决策时受到误导，使群众的失业艰难无法真实地向国家和社会表达。

时，政府作为监管部门，应正视消费者的相对弱势，要以理性监管来弥补消费者理性不足。

更重要的是，殡葬还关系到死者和家人的尊严问题。遗体接运、冷藏、火化、骨灰寄存等事项，这些死者必不可少的服务，不仅涉及到一个国家对公民尊严的重视，也是文明的重要标志。如果在政府管制下的殡葬业在这方面大渔其利，一个成本几十元的骨灰盒，一套普通的寿衣，就高价卖到数百、数千元。这不仅是个暴利问题了，这也是对死者和家人尊严的裹胁。

因此，笔者认为，“理性消费遏制殡葬暴利”，实在是有推卸责任之嫌。解决暴利的钥匙只有一把，即打破体制垄断，政府必要管制，保持行业公益性。为其如此，公民今后才“死得起”，死者和公民的起码尊严才不被裹胁。

莫让殡葬暴利裹胁死者的尊严

□ 陈岚桦

清明时节，有关殡葬的话题开始浮出水面。公众对于殡葬业奇高的费用诟病不已。近期，国家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殡葬行业具有公益性服务的特点，不具有充分市场化的特征。同时，由于殡葬行业的特殊性，是自然垄断的行业。遏制暴利一要靠政府对殡葬服务和收费项目加强管理，二要靠消费者在选择服务项目时理性消费。（4月3日《中国新闻网》）

这位民政部官员的话的意思，似乎是

殡葬业有自然垄断性，因此就有了其高收费的合法性。而且，殡葬业的高收费也是与公众不理性消费有关。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首先，殡葬业有自然垄断的特点，但这种特点不该成为高收费的理由。相反，殡葬业正因为具有自然垄断的特点，政府才应该进行必要的价格干预和管制，做到垄断者不应过分利用其优势地位而大渔其利。同时，殡葬业还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对于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益性行业，政府的态度应该是积极介入、管制价格，而不是与民争利。公益服务本身应该微利甚至零利润，

而现状是恰恰相反，殡葬业与国内其他垄断行业一样，成为掠夺暴利的代名词，这也与公益性的特征不相符。

至于殡葬行业消费者不“理性消费”，这也是欺世盗名。殡葬业是一个特殊性行业，死者家属在悲痛中不仅具有心理负担，而且有极大的道德压力。在这两种双重压力下，使他们不可能与商家讨价还价。因为一旦还价，死者家属就会背负对死者的极度不恭，甚至“不孝”的“罪名”，绝大多数死者家属若真要能做到丧事上理性消费，这需要移风易俗和重塑民族心理，远远不是说几句“理性消费”就那么轻松打发的。此

缺乏自主品牌、只出口“零件”“为别人做嫁衣”，金融危机下—— 警惕文化产业的“纽扣现象”

文化观察

制造打火机，可有的打火机不如国外的火柴值钱；制造纽扣，可纽扣却被国外用来做成品牌服装……这是实体经济中不少“中国制造”的特点：为国外做贴牌加工，出口的是类似纽扣这样的小零件，高附加值被国外赚取。

在文化制造业领域，近两年来也出现了缺乏自主品牌、只出口“零件”“为别人做嫁衣”的情况，被称作文化产业的“纽扣现象”。

在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下，改变文化产业的“纽扣现象”，到了需要破题的时候。

为别人“打工”，永远只能
挣到一颗纽扣的加工费

在文化界，不少人提起这样一件事。两年前，由国内优秀杂技团同加拿大太阳马戏团合作打造的一部剧目，由外方每年安排演出 300 多场，每场票房十几万美元，国内的杂技团每年拿到的演出费却只有 60 多万美元。

“一块金子，只卖出了铜的价钱！”天创国际演艺公司总经理曹晓宁说，“太阳马戏团凭借着享誉全球的品牌，拿到了高附加值；而我们辛苦打造的优秀剧目，却只赚到了辛苦费。”还有人认为，这好比国内过去一些纽扣、服装等制造业为国外做贴牌生产一样，而高额利润进了国外品牌公司的腰包。

再以我国动漫产业为例，《人猿泰山》《玩具总动员》等人们熟悉的好莱坞动漫大片，都曾在国内的深圳等地加工制作，靠拿订单做加工一度成为国内大多数动漫制作公司的主要业务。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锋说，我国动漫年生产能力虽然达 13 万分钟，可许多企业收益很低。

在有多年动漫制作史的深圳翡翠数码公司，一位业务负责人说，中国动漫制作过去被认为技术装备不行、水平差。事实上，现在国内已具备生产国际一流动漫产品的技术工艺与人才，却还是为国外打工，处于价值链最末端。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邵述裕说，电影、演艺界普遍存在贴牌现象：一种是导演与演员是中国人，投资方与销售方是国外文化公司，利润大多让国外拿走；一种是国内只提供一些“零件”式的节目素材，节目编排与市场推广是外国公司，国内企业收益微薄。

据文化部门提供资料，世界金融危机下，出现



图为杂技演员在郑州体育场表演。新华社发

化产品零散输出，只是人家的工具，只能卖出“机器零件”的价钱，卖不出整部机器的价格。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话语权”，外国文化企业也常常把中国的文化产品拆散购进。曾导演过《北京 2008》的孙健君说，文化出口绝不能“零卖”“贱卖”，而要学会做“自主品牌大菜”。

文化产品“零卖”或“贱卖”，成为一些生产单位之痛。一年前，中国杂技团编排的一个节目在国内获大奖，却廉价卖给外方。“外方玩的就是空手道，只有编导与管理人员，用中国的演员、单个节目来组装自己的‘大制作’，赚取高额利润。”中国杂技团负责人孙力说。

文化界人士认为，“纽扣现象”的困扰虽然在金融危机下凸现，可背后却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深层次弊病：中间产品非终端化、低端产品不自主化、加工产品非品牌化。这种“替人做嫁衣”的问题，没有危机也迟早会暴露。

宁波市在文化产业现状调研中发现，从当地文化产业增加值看，生产企业多集中在加工复制环节，普遍存在上游原创不足、中游生产集约化程度不高、下游市场营销能力不强的问题，因而处于价值链末端，对国民经济贡献率低。

金融危机，正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之机

今年初，由中演公司与山东杂技团合作的综艺舞台剧《中国风》，开始走出国门，在北美近 70 个城市进行商业巡回演出，令人欣喜的是，这台“中国制造”不但没有“散装销售”，反而集成了美国爱乐乐团双簧管首席演奏家等国际文化元素，为其所用。

不难看到，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形成的倒逼机制，为中国的“文化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

中演公司总经理张宇说，现在国外市场萧条，平庸的产品被挡在大门外，一些低小散的生产单位将在洗牌中逐步被淘汰，真正抗风险能力的是有“自主品牌”的“满汉全席”，它们反而逆势而上。

张宇认为，在金融危机下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一是改变过去零散出击的单兵作战，实施联合“立体走出去”；二是改变过去“互挖墙脚”式的出口，不搞低端市场上的互相杀价；三是集成国内外多种资源，形成强大的民族产业人和市场主体。

研究人员认为，即使卖“文化纽扣”，也要提高附加值，重视知识产权，改变过去只卖制品而忽视版权的情况。两年前，我国出口版权 2000 多种，引进版权上万种，这种无形资产上的“逆差”，是造成一些企业文化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之一。

记者 李亚彪 傅琰（新华社杭州 4 月 7 日电）

江西一农民 雕刻 7054 枚奥运印章

据新华社南昌 4 月 7 日电（记者沈洋）江西进贤县一农民历时 5 年，雕刻了 7054 枚奥运冠军和参赛项目印章，目前仍在雕刻。他希望把包括北京奥运会冠军在内的《历届中外奥运冠军印谱》作为礼物送给国际奥委会。

这位农民叫徐华明，今年 50 多岁，是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2001 年 7 月 13 日，北京获得 2008 年奥运会主办权的那一刻，徐华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把奥运会诞生以来所有奥运冠军的名字和参赛项目刻成印章，用中国独特的艺术形式记录奥运历史，展示和传播中华文化。

但是，对没上过大学、对英语一窍不通的徐华明来说，弄清楚奥运冠军的姓名和参赛项目是个大问题。2003 年 2 月 19 日，在国家体育总局相关人员的帮助下，徐华明终于查实了历届奥运会冠军的名字，并把全部精力投入创作中。

2008 年 5 月，除了北京奥运会冠军之外，一幅长达 102 米的《历届中外奥运冠军印谱》终于大功告成，所有冠军加上参赛项目的印章共计 7054 枚。

我省两画家获 “大东方”画展优秀奖

本报海口 4 月 7 日讯（记者卓兰花实习生黄智）记者今天从海口画院获悉，近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 60 周年——2009 大东方当代油画作品展”评比揭晓，我省青年油画家周铁利、周国富分别创作的油画作品《竞艳》（布面油画）、《黎家风情》获得该画展的最高奖项优秀奖。

据介绍，这次画展是全国性油画大展，由中国美协美术杂志社与上海大东方当代艺术中心联合举办。评审委员会从全国各地选送的 8000 多件油画作品中，遴选出入选作品 280 件，其中，获得优秀奖的作品有 60 件。

周铁利和周国富均为我省本土实力派画家，两人入选的作品都有一个鲜明特色，即反映海南岛热带的自然风情和民俗风貌，具有强烈的海南地域特色。

